



卡尔·毕歇尔与德国新闻学的兴起

刘兰珍

摘要: 卡尔·毕歇尔是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也是德国新闻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发表了重要的新闻学论文《报业的开端》,并从经济学的视角,将报纸角色与功能研究置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语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德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所,探索新闻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设置第一个正式的新闻学教授职位。在其努力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获到承认并得以快速发展。

关键词: 卡尔·毕歇尔; 德国报纸; 国民经济学; 新闻研究所; 新闻学

德国新闻学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异于美国的模式,早期主要是由一些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如卡尔·克尼斯、阿尔伯特·舍费尔以及卡尔·毕歇尔^①等。他们既是国民经济学家,同时都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实际经验,对新闻业日益强大的作用与日渐显露的弊端有着亲身的体验与思考。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报纸的功能、报纸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报纸广告等各方面进行了探索,为德国新闻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卡尔·毕歇尔对于德国新闻学的建立与发展,乃至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更是功不可没。

一、卡尔·毕歇尔的新闻实践

卡尔·毕歇尔这个名字在中国为人所熟悉,主要是他作为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及其著名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但其对德国以至欧洲新闻学发展的关键作用,则基本被忽视。在此,笔者试图对其殚精竭虑创立新闻研究所进而创立德国新闻学的经过进行梳理,让中国学界对德国新闻学这一学科历史发展的脉络,有一个大致了解。

(一) 卡尔·毕歇尔其人

卡尔·毕歇尔(Karl Bücher),1847年出生在黑森州,1930年11月12日在莱比锡逝世,是德国乃至欧洲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也是欧洲新闻学的创始人之一。1866年起他在波恩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历史学与哲学,187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于1872年通过国家考试。在美因茨河畔法兰克福担任教师期间,他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

1878年他接受《法兰克福报》发行人莱奥波尔多·松莱曼的邀请,担任该报社会与经济政策版编辑。俾斯麦时代开始后,由于对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开始着手他的大学教职论文,后成为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

从1881年起,他先后在俄国杜帕特大学、瑞士巴塞尔大学以及德国卡尔斯鲁厄技术

^① 卡尔·毕歇尔的生平介绍主要参考维基百科卡尔·毕歇尔词条和谷歌搜索,以及一些德国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网页介绍。

大学担任教授。在此期间他当选为国际统计—经济学会主席,其大部分研究也都与经济和统计相关。1901年至1923年卡尔·毕歇尔担任当时德国经济学领域最主要的杂志《政治经济学杂志》的发行人。

1892年,毕歇尔来到莱比锡大学,在那里执教至1917年,这是他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为丰富的一段时间。1893年他出版两卷本的《国民经济的起源》,提出了“经济阶段理论”,这给作为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他带来了极大的声望与知名度。

毕歇尔是欧洲在大学开设报学课的第一人:1884年他在巴塞尔大学开设每周一小时的关于报业的历史、机构和统计的公选课;在莱比锡大学,他以经济学教授的身份把这种传统保留下来,但对这个课程进行了重大改造,使这门关于报纸理论方面的课程最后变成互相衔接、每周三小时、跨度为三个学期的大课:(1)报业的历史;(2)现代报业的机构与技术;(3)印刷政策^①。当时作为莱比锡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埃米尔·杜费法特,选修了卡尔·毕歇尔的《报业的历史、机构与技术》课程,并提交了一篇研究手书报纸的作业,这是这位未来的新闻学家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新闻,对他后来从事新闻学研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②。

(二)创建新闻学研究所和新闻学专业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新闻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其存在合理性开始时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虽然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思考报纸及其作用,但是这些学者并未将这种工作付诸实践并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

与学界相反,业界对将新闻业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愿望却日益强烈。出版发行人和新闻记者团体,都希望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学科能为记者提供专业的培训机会,以此来提升职业与新闻的声誉。但是,德国大学的普遍反应是对报纸的不信任,因为当时德国报纸的名声并不好。学者们担心,如果让这样的报纸成为一个学科,那么这个学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愚弄民众的《综合报》,并使那些愚弄民众的报纸的地位得到提升,这对社会将是非常危险的。当时的德国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运用历史知识进行论证,认为报纸是影响舆论的有力对手。这种观点在当时成为了“真正的舆论”,并对政府管理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报纸的评价是:摇摆不定,易于操纵,唯利是图。19世纪末20世纪初,“记者式德语”对于学者而言是最尖锐的批评字眼。

在反对的声浪中,身为经济学家的卡尔·毕歇尔进行了大力反驳。他指出,创办新闻学专业符合国家利益。应该说,他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想当然。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卡尔·毕歇尔就敏锐地注意到,德国的媒体在战争中存在着巨大的失误与失职,他们的报道竟然招致了中立国对德国的反对。由此他感到有必要运用某种公开的手段对记者进行教育,以提升报纸的道德水准,为此他提出应该创办报纸研究所。他对于报纸的兴趣虽然让同事们摇头不屑,但是他学者的巨大声誉并未受到损害。退休后,他仍保留着教授称号并在大学继续致力于在国民经济理论框架下将他在法兰克福报记者的经历理论化,其成果就是创立了新闻学。由于获得了一位报纸发行人的经济捐赠,1916年11月毕歇尔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德国第一家新闻学(报学)研究所。其目的是为有名气的记者提供学术以及专业知识的储备,进行报纸的专业培训,以提升整个新闻业的水准。这个研究所的成立,对于报纸在众多的学科领域中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他持续的坚持和呼吁下,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批报学研究所纷纷成立。至二战爆发之前,德国的科隆大学、明斯特大学、纽伦堡商业大学、柏林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弗莱堡大学、海德堡大学和哈勒大学、柯尼斯贝格大学都成立了新闻学研究所。新闻学研究在德国蓬勃兴起,并发展成为一门逐渐成熟的学科。

但卡尔·毕歇尔的理想并不仅仅在于成立研究所,他还想为新闻学在严肃的科学研究中争取到一席之地。与当时已经成为德国大学的主流学科并硕果累累的社会学相比,新闻学没有任何学科基础:没有图书目录学,没有专业期刊,没有国际学术交流,总之,一切能证明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所必备的东西

^①Otto Grot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Buchverlag Dr. Konrad Weinmayer GMBH, Muenchen, 1948, p. 375.

^②Klaus-Ulrich Benedikt, Emil Dovifat, *ein katholischer Hochschullehrer und Publizist*, Matthias-Gruenewald-Verlag, Mainz, 1986, pp. 4~5.

都没有,且几乎没有国家拨款,人事编制与财政预算皆难以落实。当时那些研究所最主要的资助者是职业协会、报社和社团。而且,在莱比锡大学新闻研究所设立第一位正式的教授之前,相关管理机构都不知道该把这种正教授职位归到哪一类职位去。

在德国的大学里,报学最初被归类到政治学的专业里,报纸研究这类课程,通常被安置在哲学或者法学和政治学系里。因此当时的各个新闻研究所都是由兼职教授、讲师和特聘教授或者其他专业的教授兼职,例如毕歇尔本人就是一位国民经济学家,另外1919年在柏林大学获得第一个报学任教合约的奥托·约林格就是一位政治学家,而敏斯特大学的终身教授弗里德里希·布鲁克也在经济学研究所设立了报学研究教研室^①。

1926年11月,毕歇尔的努力争取终于有了成果:莱比锡大学设立了新闻学(报学)专业,诞生了第一个正式的新闻学(报学)教授。埃利希·埃维尔特幸运地获得了这个正式的报学专业教授职位,任职时间为1926年至1933年。这个专业的正式教师职位有5个,除了正式教授埃利希·埃维尔特外,还有5个编外讲师,1个非公务员待遇的教授,2个计划外的兼职教授,两个计划内的兼职教授,两个正式的名誉教授,一个基金会教授,一个代表委员会的教授。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德国各大学共出现了21个报学的教职教授,包括柏林大学的埃米尔·杜费法特,以及汉诺威科技大学的瓦尔特·海德。

同年,第一个新闻专业杂志问世,名称就叫《报学》(Zeitungswissenschaft),由卡尔·德斯特和瓦尔特·海德创办。30年代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也设立了报学专业,其负责人埃米尔·杜费法特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终于成功将电影与广播纳入到报学中来,并将这门学科拓展为“新闻学”(Publizistik)^②。

二、卡尔·毕歇尔的新闻思想

在《报业的开端》等一系列著作里,毕歇尔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语境中,从历史的视角,对报业形成原因、报纸社会功能、报纸与舆论的关系、报纸与广告等各方面进行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较为全面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结合其相关著述以及对他的研究资料,可以将其新闻思想归结如下:

(一)经济利益是报纸的直接推动力

对于现代报纸形成和发展的普遍原因,毕歇尔指出:“文化发展的三股洪流在报业的发展中汇入同一个河床,为的是在这里汇集后继续流淌。一个来源于政府机关的需求,一个是社会和经济运输的需求,第三是个体追求视野的开阔,以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同时代人和环境的经历与精神生活之中的需求”^③。他认为,报纸有维持和传播社会与经济联系的作用。在对新闻事业创造力量的总结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真相,即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报纸出现的直接推动力。最古老的报纸是书商投机活动的结果;相对于国家的出版需求,出版商对利润的追逐是周报形成的最原始也是最有力的动机。

(二)报纸是一种资本主义企业

对报纸在整个社会中的功能,毕歇尔认为,报纸也是“传递的环节”,一个主导机构,“报纸首先是一种运输设施,它构成当代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支撑机构之一。……将现代人类与社会紧密相连,除了邮政、铁路和电报之外,报纸是首先必须提及的。事实上,报纸构成了现代交通运输手段链条中的一环,就是说,通过那些设施,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交换得以实现。”^④不难看出,这里体现了他作为国民经济学家典型的经济视角。

关于报纸企业及其结构、经济和技术的生产,毕歇尔在其著作中并未继续讨论。虽然他在《国民经济的起源》第二卷提出了一个对报纸和期刊生产非常重要的“规模生产法则”,但是这个法则在报纸和杂

①Stefanie Averbek. *Kommunikation als prozess, sozialologische perspektiven in der zeitungswissenschaft 1927-1934*, german edition 2004, pp. 47~63.

②在本文中,交替使用了新闻学与报学两个不同的概念,主要是尊重国内学界的沿用习惯。但这两个概念在卡尔·毕歇尔的著作以及当时德国的新闻学著述中都是一个名词“Zeitungswissenschaft”即报学,盖因报纸乃当时的主要大众媒介,也是毕歇尔等研究新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20世纪30年代,由另一位德国的新闻学家埃米尔·杜威法特将电影和广播等也纳入到研究范畴,这个学科才最终由“报学”(Zeitungswissenschaft,变成了“新闻学”(Publizistik)——作者注。

③Otto Grot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p. 286.

④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Aufsätze und Beiträe*. Laupp, Tübingen, 1917, 10. Auflage, 232f.

志生产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并未在足够和相应的企业中进行检验。而毕歇尔本人对这个法则在报业与杂志业中的意义也未予以深究。

(三)报纸是公共舆论机关

毕歇尔认为:“当报刊接受来自于大众的思潮,并赋予它以形式与方向,以此为基础向当局提出要求,它就成为了公共舆论的机关。但是在它对个人或整个大众群体的判断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也影响着舆论”。毕歇尔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报刊按照自己的意思“制造”大众的意见。因此他在《政治手册里的报刊》一文中说道:报刊虽“不能制造这种意见,但是可以探测到它并进行加工,为其指出目标与路径,但也会误导和腐蚀它。……报纸更多的是给予民众一个合适的表达,表述它,以理由充足的方式将它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强烈地作用于人民的意见和认知。一个报刊,如果其行为与大众的意识相左,就失去了作用。……报刊在对朦胧的民众意识进行不正确的解读,以及对最新事实的原因解释错误,并将大众普遍的不满往错误的目标上引导的时候,就会误导公共舆论。”^①

在毕歇尔看来,报刊即使不是舆论的起源,也是唯一的从悠悠众口中提炼出舆论并使之为人所见的手段。报刊将由它所塑造的,或曰由它提炼和过滤的公共舆论重新投入使用,使得人们得以从报刊中了解和使用公共舆论。公众意见与公众情绪,二者最重要的传播方法与手段就是报纸。毕歇尔认为,定期报刊使得读者没有时间来形成和审视自己的判断,它借由“印刷品诱惑的力量”发挥作用。于是,“那些开始时只是个别的或者很少在报刊上出现的观点,变成了大众观点,其道德变成大众道德,其追求变成了所有读者或者绝大多数读者的大众追求。”^②

(四)报纸是文化与教育机关

毕歇尔还认识到日报之于当今文化人类巨大和多方面的益处,他认为:报纸为民众提供无法估量、无边无际的文化内容,增进他们的共同感情,将每一个精神行为变成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报纸是未来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来源,是普遍的教育和进修的手段,它释放着一个国家的精神力量;同时它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也十分突出:没有报纸的新闻工作,私人的、民族的和世界经济就不可能形成。

(五)报业与广告休戚相关

作为国民经济学家,毕歇尔敏锐地注意到报纸与广告休戚相关的关系。他认为,报纸之所以会对社会、对公众造成伤害,其根源是报纸与私人经济企业的利益关系。“现代报纸最严重的缺陷是它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特点,就是说,报纸只是发行人获利的工具,而发行人对于一张报纸应该实现的理想目标,原本就是十分陌生的。”^③

为了防止报刊与新闻贿赂的危险,毕歇尔第一个提出要对这个职业进行精神、道德和社会的改善,缔造“有才华的、独立的和诚实的”记者阶层,为此需要给记者提供进行标准的(学术的)职前培训的机会,并废止不署名制度。1915年他撰文专门论述在高校除了报学理论和课程设置外,还应对记者进行学术的职业培训;当时德国新闻业实行匿名制度,其理由首先是新闻报道代表的是报纸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报人避免公众的批评等等,这些在毕歇尔看来,都不足以令人信服。他认为德国报纸中普遍使用的匿名制大大降低了报纸的道德和知识水准,并且降低记者队伍对公众的关注程度,而署名则会使优秀的记者成名并独立,而公众对报纸的批评就会变得更为自主。

卡尔·毕歇尔从大学教授的学术高度来评判报纸这个职业,往往带有一定的教条主义色彩,尤其是他后期发表的著作中,主观和武断的观点更为明显。比如他说:“编辑工作纯粹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只在广告版面出售中存在;仅仅是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主顾,出版人才会考虑使用编辑手段。”“编辑本是个增加成本负担的部分,……如果报纸是一个谋利的企业,那么广告就是只有通过编辑工作才能卖出去的商品。”^④这些论点显示出毕歇尔的观点脱离了报业与经济实际联系,受到后世的诟病也理所当然。

①转引自 Otto Grot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pp. 248~251.

②转引自 Otto Grot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pp. 248~251.

③Karl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Aufsätze und Beiträe*, 232f.

④Otto Grot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pp. 293~294.

三、卡尔·毕歇尔对德国新闻学的影响

卡尔·毕歇尔重要的新闻学著作,除了1903年的《报业的开端》之外,主要还有《报业》(1912)、《德国的日报与批评》(1915)、《报纸研究论文集》(1926),此外,他众多新闻学的文章被后人结集成《新闻学文选》。这些学术著作,为德国新闻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学科基础。而由他直接促成的报学研究所和报学专业的成立,对于德国新闻学的发展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汉斯·波曼写道:报学在卡尔·毕歇尔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开始在许多高校发挥作用。从计划外到计划内的师资,从兼职教授到专职教授,并且同时取得了主要专业的资格。这条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开始了,当埃利希·埃维尔特被选为卡尔·毕歇尔的接班人时,博士生招生口试可以单独由学科委员会来举行,而且这个专业也有权接受教职申请。政府方面对它的推动也十分明显。这要感谢报学,使越来越多的系和专业纷纷成立^①。

由于卡尔·毕歇尔的大力推动,并随着报学专业的成立,一批新闻学者脱颖而出,一大批有分量的新闻学著作纷纷问世。当时,著名的新闻学者除了埃利希·埃维尔特之外,还有埃米尔·杜费法特,他在1933年之前出版了《论报纸》(Die Zeitungen, 1925年)、《美国新闻学》(Der amerikanische Journalismus, 1927年)、《报学》(Zeitungswissenschaft, 1931年);还有奥托·格罗特,出版了《符腾堡的政治报刊》(1915年),并从1928年到1930年连续出版了影响巨大的4卷本的学术著作《论报纸》。这些人成为德国新闻学和传播学发展的中坚力量。

日本京都大学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家佐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②中将1893年布歇(即毕歇尔)《国民经济的成立》的出版、1915年权田保之助翻译布歇《经济文明史论》、1916年布歇在莱比锡大学设立新闻研究所视为传媒史上的重大事件。

遗憾的是,作为德国新闻学的奠基人,有关毕歇尔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了解的人并不很多。英语世界中对毕歇尔的传播思想研究最为深入的是美国衣阿华大学的汉诺·哈特教授,他在1979年出版的《报刊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专门有一章论及毕歇尔^③。

卡尔·毕歇尔的名字也曾一度为中国新闻学研究者所关注。1914年《进步》杂志第5卷第1、3、4期刊出了从日译本转译的长篇连载《新闻纸之源流》,对当时的新闻学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1927年戈公振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一书多次引用毕歇尔(戈氏译为毕修),该书仅在《报纸的定义》一节提及“毕修”就达7次。但是,自此以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似乎遗忘了这个重要的名字,仅仅只有2004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艳和王凯波根据哈特的著作写成《社会的交换——卡尔·布赫尔媒介思想简介》一文。

日本学者和田洋一认为,毕歇尔是一位对日本新闻学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德国学者,他在《新闻学概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莱比锡大学的第一任新闻学教授卡尔·毕希纳,曾经作为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而闻名全世界。他的著作《国民经济的形成》被译成日文,题名《经济文明史论》,于1917年由内田老鹤园出版发行。其读者之多,令人惊讶。该书中收录的有名的论文《新闻事业的起源》,当时就被英美体系的新闻学研究家杉村楚人冠读过。德国的新闻学以这种方式,也给予英美体系的日本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④

■作者简介:刘兰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3。

■责任编辑:车 英

① Wolfgang Duchkowitsch (Hrsg.). *Die Spirale des Schweigens. Zum Umgang mit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Zeitungswissenschaft*, Lit Verlag; Auflage: 1., Aufl. (Januar 2004), pp. 97~98.

②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Hanno Hardt. *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79.

④ 和田洋一:《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230页。